

# 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的基本特点与理论贡献

王毅武

本文依据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学说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系统考察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的产生、特点与历史贡献。此论题国内经济理论界虽较少论及,然而其却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的基本问题。科学并系统地总结与概括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的特点与基本经验,历史地阐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是本文的任务。

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而首先对于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学说的伟大独创性贡献。系统研究并总结中国工业化理论的独特成就与理论贡献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尽早实现四个现代化极其必要和重要。

中国的工业化理论是很有特色的,这些特色直接产生于中国的具体国情与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特殊性。

从过去的实际情况看,世界上出现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是由经济落后国家转变而来的,因此初期都面临着一个实现国家工业化、迅速建立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的严峻局面。在旧中国,基本的事实是单纯依靠技术进步和工业自身的发展已不可能使中国正常实现工业化。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只有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在国家获得独立和解放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这样,中国工业化的前提及意义,当然地也就成了中国工业化理论的重要特色。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sup>①</sup>。后来毛泽东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再次指出:“没有一个独立、自主、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只有中国的工业发展了,中国在经济上不依赖外国了,才有全部的真正的独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使国家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实践也证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农业国,没有自己发达的工业,特别是没有作为整个工业发展基础的重工业,就谈不上以强大的工业来改造全国范围的落后的农业,就没有人民的富裕和

国家的富强。这里的基本点在于，中国要实现工业化，首先必须有独立和主权；同时，也只有实现了工业化，中国才会有真正的独立和主权。再进一步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社会性质的规定，也是中国工业化不同于西方国家工业化的基本特点。

中国是在一个经济与文化极为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农业国里，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通过人民民主专政开始建立自己的物质技术基础与经济关系基础的。历史与国情的基本事实把中国的工业化摆到了这样一个特殊的基础和起点上，从而构成了中国工业化理论的又一重要特色。具体地说，一是中国工业化的最初物质技术基础主要是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而形成的。由于没收了新中国成立之前全国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固定资产80%的官僚资本为国有资产，银行也转归国家所有，这样巨大的经济力量集中到国家手里，就为中国工业化的起步建立了主体力量和前进基地。二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确立，为中国工业化的实现创造了社会主义的环境系统。中国实现工业化，当然主要是依靠发展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依靠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但绝不可忽视资本主义私营经济以及其他经济成分。国家资本主义在中国工业化的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特殊意义。历史地看，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把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必要的，这对于强化当时已经建立起来的国有经济起了重要作用。但如何对待私营工商业，特别是如何认识他们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与意义，不能说不是一个极关紧要的实际问题。应当说，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行，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质性起点。党在这一时期的总路线的主体，就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归根结蒂也还是为了通过变革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生产创造社会条件，即经过长期的努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这里，至少还应该注意到两个问题，其一是中国工业化的启动时间比起西方工业化国家已经晚了一个世纪左右；其二是中国工业化的起点大大低于几乎所有的先期工业化国家。这种情况表明，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国际环境是严峻的，整个过程将是艰巨的、痛苦的、长期的。如果不能充分地认识这些特殊性，犯错误而贻误时间并发生波折是可能的。

中国的工业化必须建筑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必须时时刻刻、切切实实抓农业，这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中国工业化理论的另一重要特色。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中国的工业化必须面对这一现实并从这一现实出发。不能用坑害农民、打击农业与轻工业的办法发展工业，也不能走资本原始积累式的发展工业的道路；而是要联系农业来发展工业，通过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这是一条既不同于西方国家工业化道路也不同于苏东国家工业化道路的新路，极富中国特色。因为，如果不发展农业，离开了农业这个基础片面地发展工业，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落后状况必定影响整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同时，在国家工业化过程中不但不能损害农民的利益，而且必须通过工农联盟的加强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中国的工业化，基本内容可以说就是如何更快更好地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与此相联系，中国工业化理论形成了自己的又一特色，这就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在中国工业化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事情很清楚，在中国工业化的过程中，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因农业技术进步而出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则工业化的实现也就成了大难题。实际上，自中国工业化一起步，这个问题就一直困扰着工业以及农业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先是如同西方国家或苏联、东欧那样，试图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或工厂中去，结果是“大跃进”下马，二千万人不得不下放农村；后来又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企图缓解城市及工厂的压力，结果也不理想；随后大办“五小工业”，社队企业，有经验也有教训；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后才真正找到了出路,这就是发展乡镇企业,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中去,“离土不离乡”,既顺畅了农业的技术改造与技术进步,加快了农业的现代化进程,又不给城市和工业的发展带来麻烦和困难,同时还极大地补充了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许多不足和不到之处,成为中国工业化的重要内容和不可缺少的方面。

由于中国工业化起步晚,起点低,加之新中国成立后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与扼杀,逼着中国的工业化不得不走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这也是中国工业化理论的一大特色。新中国成立后,曾想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尽早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然而却是可想而不可得,只有横下一条心,走自己的路,自力更生。这一方针的提出,深含着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欺辱与宰割之苦,显现着中华民族的强烈自尊心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信心,表明了中国工业化的内在动因与基本精神。但这一方针从来都不排斥“向外国学习”,“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sup>⑥</sup>。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我们的事业而首先是国家的工业化不利。这就是说,中国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必须重视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经验,洋为中用,努力使世界各国工业化、现代化的理论“中国化”,即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应当说,向外国学习工业化,也是中国工业化理论的特色之一。

到目前为止,中国工业化过程中还有一个必须引起注意的特色,这就是有急于求成的痼疾。具体表现为时常忽视客观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发展的综合平衡,片面夸大生产关系的改造与调整对于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把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强调到了不适当的地位与高度。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起,不断的“小冒进”酿成“大跃进”,主观主义和空想色彩的“赶超战略”最终不得不归于失败。这是一种背离本意的失控性失败,也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第一次脱离国情的重大失误。本来,急于求成的病根应该就此拔除,但以后的事实并非如此。“文化大革命”中,“以钢为纲”变成“以战备为纲”,一方面要集中力量建设“战略后方”,建立自成体系的经济协作区;另一方面地方“五小工业”又全面铺开,到处开花,企图使国民经济实现“新飞跃”,从而造成国民经济一系列重大比例关系再度严重失调,整个经济跌到了几乎崩溃的边缘,这又是一次极为惨痛的教训。可是,这一剧烈波折刚过去不久,又出现了不顾国情国力而以过急、过快、过多地引进国外技术设备和大规模举借外债为特征的“洋冒进”,希望以此来高速度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虽然“大跃进”、“新飞跃”与“洋冒进”各自所发生的社会经济环境有所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发生于不顾客观实际的“左”的主观错误,都是急于求成这一痼疾的“病理反映”。这种急于求成不仅表现在对中国工业化的时间估计上,而且表现在中国工业化的部署、步骤、布局、决策、调控等若干方面,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发生。这就告诉我们,“左”的错误一日不根除,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就一日不平坦,而且不可能不殃及其理论与形态。

中国工业化除上述特色而外,还有其他一些特色,如一般劳动力富足,企业有机构成的提高并不十分迫切;与此同时,技术劳动力特别是高级技术人员缺乏,因而向科学进军的任务相当繁重并急迫,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成为中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关键所在等。所有这些特色一方面客观存在,另一方面,对于这些特色的研究与说明,显然也就成为中国工业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对于马克思再生产学说的丰富与创新。

## 二

中国的工业化理论不但自成体系,而且对于马克思再生产学说做出了重大贡献。历史地考

察中国的工业化理论,不难发现,它并不是始自新中国成立后走上工业化道路之时,而是在此之前就已经产生了。远的不用涉及,仅就民主主义的实业思想以及1911—1949年的三十年期间,以工业化为主题的诸多著作与论述,如以刘大钧为首编著的《工业化与中国工业建设》、《工业化与中国农业建设》等丛书,翁文灏等编辑的《中国工业化丛书》,张培刚在美国哈佛大学写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等等,对于中国工业化的蓝图、框架、道路、资金、技术、资源、组织管理、经营方式,甚至具体项目等均有探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们的著述中,几乎都涉及或论及到了中国工业化问题,并各有侧重,各有特点,各有见地。最有代表性的是毛泽东。在他的著述中,始终强调工业化问题,内容丰富,阐释科学,很有创见。无论是以孙中山为代表还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两个方面的工业化理论,都只能是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才有可能付诸实践,亦即只能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工业化才有可能成为现实,并且,只有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中国真正的独立和解放“才算最后地解决了”<sup>⑥</sup>。因此,结合新中国工业化的实践来考察中国工业化理论,特别是研究中国工业化理论对于马克思再生产学说的重要贡献,不仅必要,而且实际。

旧中国曾经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经济是相当落后的,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现代工业也只占国民经济的10%左右,而且还带有浓厚的买办性和封建性,大都集中于轻工业方面,重工业几乎是空白。这种情况不仅决定了要对原有工业从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且决定了“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sup>⑦</sup>。这里,马克思的再生产学说很自然地就同中国的工业化问题联系起来,并表现为中国工业化理论了。毛泽东在提出中国工业化道路实际是农、轻、重的关系问题后,又提出安排国民经济计划要以农轻重为序。于是,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实际上就成为在国家计划中投资的比例如何安排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虽然已开始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再生产学说中国化了,但他关于在中国实现工业化道路的思路与斯大林的思路从总体看并无大的差别,都从根本上忽视了社会再生产的实现问题,亦即市场问题,或者说是排斥商品经济。因而在我国一再出现以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为主要特征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巨大缺口,出现了“按比例、常失调”的再生产怪圈。但是,实践中的失误并不能否认中国工业化理论在处理两大部类关系方面的科学贡献。

实践中的矛盾与问题,往往是理论发展与完善的动力。马克思再生产学说在中国具体化为工业化理论之后,由于多次出现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因而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理论就成为中国工业化理论的重要内容。财政、信贷、物资、外汇“四大平衡”是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重要保证,亦即马克思再生产学说中实现条件的具体化,这就从把两大部类具体化为农、轻、重,再把社会再生产具体化为工业化道路,这不只是抓住了马克思再生产学说的核心,而且还是对马克思再生产学说的重大发展。

实现工业化的方针问题,是中国工业化理论的重要方面。这里所说的方针问题,实际上是实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指导思想。首先是,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农业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先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取得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生产关系基础;其次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国际环境,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坚持以独立自主为基点,积极争取外援;再则是,在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要“更加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sup>⑧</sup>,科学技术是工业化问题的关键。特别是,在中国工业化问题上,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能机械地搬用外国的经验。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的,是为了逐步满

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是要建设一个国家强盛、人民幸福、秩序安定的新社会。这些,马克思的再生产学说都是没有论及的。

对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实现工业化的外部环境条件都极为重要。可以说,实现工业化的过程,即是整个国家振兴图强的过程,也是向世界发达国家学习的过程。世界性经济交往的普遍发展与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对于经济落后的中国,这个问题更显得真切与紧迫,即参与世界性经济交往更具有突出的意义和作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都已证实,自我封闭,与世隔绝,完全无视国际环境,忽略可利用的条件来迅速实现自己国家的工业化,实质上是自我扼杀。只有面向世界,改革开放,才是富民强国之路。中国的工业化必须更高层次、更大步伐、更有实效地走向世界。改革开放十多年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已经使得中国的工业化理论在这方面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如建立经济特区、大胆引进外资、争取一切可能的国际援助等,不但加快了我国工业化的历史过程,而且丰富了马克思再生产学说。

马克思再生产学说的核心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实际上也就是市场问题。由于我国工业化理论曾一度忽视社会再生产的实现问题,因而使得自己的理论出现了某些缺陷或扭曲。实际上,我国的工业化不仅面临一个国内市场问题,而且面临一个国际市场问题。五十年代,世界分为“两个对立阵营”的观点促使我国的工业化理论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两个互相平行但也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加之资本主义世界对新中国实行的经济封锁,我国的工业化只面对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世界市场。在国内市场问题上,由于在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认识问题上有偏差,因而也给我国工业化的实际进程造成很多不利影响。虽然其间市场问题不断地被从各个角度提出来,但从总体上看,始终没有得到认真对待和科学研究。这些,都是我国工业化理论应当认真反思并完善的所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工业化理论注意到了并开始纠正这方面的问题,不仅从若干方面丰富了马克思再生产学说,而且明确提出我国工业化应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从而为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宝库增添了崭新内容。

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包括产业结构的改造、特征及重点理论,是我国工业化理论对马克思再生产学说的又一大发展。经济发展战略是指较长时期内依据影响经济发展的各种条件,综合考虑经济发展各方面的关系所制定的经济发展目标,以及为此所必须采取的根本性措施与关键性步骤的概括或总和。如何实现工业化是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问题。回顾我国经济发展的曲折历程,科学确定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经济发展战略,并相应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保证加以实现,对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马克思再生产学说增添了崭新内容。新中国成立后提出的第一个长期的经济发展战略,就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个经济发展战略是符合实际的,因而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无论是发展速度,原有产业结构改造,还是经济效益都比较好,举国上下确实出现了一派繁荣景象,社会主义再生产有血有肉,有条不紊,为我国后来的经济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不久,经济发展战略发生了变化,开始以发展速度为中心,提出“超英赶美”,不切实际地要求在15年内使主要产品的产量超过英国,然后再用20到30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或超过美国。后来甚至提出“五年超英,十年赶美”,使中国尽快走在世界经济的前列。这是一个失败的战略,不但工业化受到挫折,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不少地方与部门甚至出现严重困难,整个国民经济失调。经过调整,于1964年提出“两步设想”的发展战略,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当然包括产业结构)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

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经济的前列。这一经济发展战略执行到60年代中后期,单纯追求高积累、高速度又占了上风,社会主义再生产在“文化革命”期间几乎难以维继,经济发展发生重大失误,产业结构出现了严重问题。粉碎“四人帮”之后又规划了一个过高的到2000年的设想,急于“买”一个现代化,国民经济各重要部门的发展再度出现失调,结果是欲速则不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改变了过去那种片面追求产值、产量和增长速度的发展战略,转到以调整经济结构(包括调整产业结构)为重点、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保证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战略,即“注重效益、提高质量、协调发展、稳定增长”,从而又为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或者说是中国工业化理论充实了新内容。可见,关于经济发展战略,实际上是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再生产或者实现工业化的总方略,为社会再生产规定了重点与要求,这是马克思再生产学说原来所不曾有的。

马克思再生产学说还有一个重要方面的内容,即关于再生产类型分析。马克思曾把扩大再生产划分为外延型扩大再生产与内涵型扩大再生产。在我国社会主义再生产的实践中,总结出了社会再生产中的经济效益问题,并强调内涵扩大再生产,不仅把经济效益(包括宏观经济效益与微观经济效益)看作是发展国民经济的中心问题,而且看作是经济发展战略的中心问题,这就更把马克思的再生产学说升华了一步,从而把再生产类型与经济效益以及发展速度联系起来,使马克思再生产学说更为丰富。

关于社会主义再生产的规模问题,中国工业化理论也颇有新意。概括地说,就是要与国情国力相适应。此外,关于经济调整理论,也是对马克思再生产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总之,中国工业化理论为马克思再生产学说的丰富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从理论上说,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不仅是马克思再生产学说在中国的具体化,而且深化了再生产的结构问题;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平衡问题,不仅丰富了马克思再生产学说中的实现条件理论,而且从方法上、操作上都具体化了;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不仅是对马克思再生产学说的创新和充实,而且以经济效益为实质实现了理论上的升华。若把中国工业化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再生产的规模、结构、速度、效益、调控、布局、步骤、措施等方面的内容加以归纳,足见其理论之丰富。如果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角度考虑问题则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工业化问题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核心。从实质看,中国工业化理论,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在中国条件下的延伸和具体化,即要在高度社会化和现代技术的基础上,缩小三大差别,实现富民强国,从而逐步向社会主义的更高阶段过渡。这是具有相当高度和深度的经济理论,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 注 释: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982页。
- ②④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7、268页。
- ③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23页。
- ⑤ 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1956年)。

(本文责任编辑 邹惠卿)